

荣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荣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73
荣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贈 閱

政协四川省荣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荣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元月

前 言

为了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推动我县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我会编印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文史资料选辑》是不定期的刊物，只供内部参改。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主席一九五九年亲自倡导的。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广泛收集、整理阅历丰富的党内外老同志和各界人士在我县各个历史时期的亲见、亲闻，为历史科学提供活的、珍贵的资料，补充书报、档案之不足，是一项惠及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

一九六六年以前，我会曾征集到部分稿件，由于十年内乱，使这项工作陷于停顿。一九七九年以来，在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下，已经征集到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部分史料，我会将陆续整理，编印成册。

我们热情欢迎各界人士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撰写文史资料的要求是“存真、求实”，客观地叙述当时的历史。文稿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计长短。对同一事件，由于各人经历角度不同，看法不一，可以多说并存。

由于我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尚属初举，经验不足，加之水平低，差误难免，敬希阅者批评、补充、订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目 录

前言.....	
“五·四”前后十年荣县的学生运动.....	
.....江锡龄 晏光侯 (1)	
回忆荣县盟史.....	刘石夷 (13)
基督教在荣县.....	林树森 (41)
赵熙与“文学舍”.....	黄永富 (65)
“文学舍”的概况.....	吴 楠 (77)
“旭阳中学”始末.....	李则夷 胡用权 (83)
解放前荣县的中医、药业.....	伍文昌 (93)
一九三六年荣县推行新制度量衡制度的	
回忆.....	江锡权 (107)
荣县兵灾片断记.....	叶 芝 遗稿 (122)
我所知道的徐思平.....	李则夷 (126)

“五·四”前后十年荣县的学生运动

江锡龄 晏光侯

要研究近代革命史，学生运动无疑是一页重要篇章。本文拟将回忆“五·四”前后十年荣县学生运动的梗概，以就正于县之人士。尚盼在此期间任教的先生、求学的学生，将亲见亲闻的往事，对本文不吝指教、勘误。

一、“五·四”前后荣县学校一瞥

清朝末年，荣县官办的学校，只有两个。一个是“凤鸣书院”（在西街）；一个是“桂林书院”（即今文化馆），专讲八股文章，培育科举人才，实施效忠封建王朝的奴化教育。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八股、兴学堂，才开始讲授新学，同时废弃科举制度。光绪三十年（1904），四川通省改书院为学堂，荣县才设“官立五年制初等小学堂”于龙王庙（即今“县种子公司”）；“官立女子初等小学堂”于后山巷（辛亥后改为高、初两级小学，后又加办师范班）。又在“文昌宫”（即今师范新校址）设立“官办高等小学堂”，初是四年制，民国后改为三年制，创办人是吴子光先生（吴玉章之二哥）。这个学堂当时可算是荣县的最高学府。规模虽不大，却为荣县孕育了不少新学人才，如黄宗义、刘殿戡、晏敬常、董厚吾、张仲儒、刘李坚、詹特权、詹联科、丁灼章等。现今荣县老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由这个学堂脉衍而来

的。

清末、县属之大乡镇大多办有“官立初等小学堂”。城区在武侯祠亦办有一所，民国后改为女子小学。

清末，官办学堂不多，私塾、家塾则各地皆有，人们把它叫做“专馆”。

民国初年，县属的官办学堂，改称“县立学校”；乡场上的官办学堂，改称“公立学校”。

民国后，公、私立的新学逐渐增多，私塾、家塾随之减少。到了三十年代，才慢慢绝迹。

“荣县县立中学校”（县人简称“县中”或“荣中”）是民国二年（1913）在西街“凤鸣书院”旧址上开办的。初为四年制，办了十六个班（通称旧制中学）后，到民国十三年（1924）全国实行新学制（中学分高、初两级）后，荣中才停办旧制，改为三年制的初中班，同时由西街凤鸣书院迁“万寿寺”今址。办高中班是三十年代后的事了，在此不提。

在民国初期，规模较大，设备完善的学校，要数教会学校。基督教办有“华英两级小学校”和“华英女子两级小学校”（均在礼拜堂附近）；天主教办有“私立初级小学校”和“女子小学校”，校址在桂林街。

“私立明新学校”是清代秀才吴岚辉先生于民国十二年（1923）将他在下河街的私塾扩充改建而成的两级小学。在荣县的私立学校中，只有他这一所，才在教育厅立了案。

“私立冶官高级小学校”，是民国十四年（1925）清代秀才龙云翥先生在西街“双花楼”（即今土产公司址）创办的，不到两年，龙先生病逝，该校也就停办了。

“私立旭阳中学校”，是荣县有名的进步人士、教育家

谷醒华先生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江西庙”(今旭光小学)创建的。二十年代末,谷先生离开荣县,“旭中”不久就结束了。

“私立旭光两级小学校”是县人吴伯修、自号“老岳者”于民国十四(或十五)年在下河街创办的,后迁“火神庙”(今即搬运站址),再迁南门坝“川主庙”(即今富南小学校址)时,即由进步人士刘一先主持。教员中,多有中共地下党人,如张本端、钟奇、钟扬明、邓可非、赵鹤仙、朱攀等。

“女子自立中学校”创办于民国十六年(1927)。因那时荣县尚无女子中学,一般中学又未开男女合校之风,一些想升学的女子,如李云志、刘淑才等,积极奔走活动,筹划自己办一所女中。在绅士张植如和几个“荣中”“旭中”老师的支持下,借用张植如一亩之房地,于当年下半年,成立荣县史无前例的“女子自立中学校”。

“文学舍”是民国十九年(1930),前清江西道御史赵尧生先生在前清“学衙门”即今荣中教师宿舍创建的,讲授经史、文学,旁及一点英文、数学。因赵先生名气大,有不少远道负笈而来的求学者。

“詹言学校”是清代秀才、又留洋日本归来的詹鸿章办的一所私塾,地址在南门坝。以讲授经史、诗文为主。

“培根学校”是詹鸿章之子詹琴芳办的一所私立初小,设备简陋,等于私塾。地址在北街,时间约在民国十五年前后。

荣县乃一偏僻之地,那时交通亦不发达。有如此多的学校林立,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文风兴盛的县份。

二、“五·四”前后荣县学生的思想演变

荣县学风，素称川南之冠，追溯其源，实自清末以来国事不振，外侮日至；四圉藩篱，先后失尽。中华民族有志之士，深感国之将亡，激愤不安，纷纷寻求救国救民之计。当时我县之吴玉章、但懋辛、谢奉琦、龙鸣剑、丁平子、龚郁文等十余人先后东渡日本，谋求救国之道。在日期间，上述诸君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遂加入同盟会，致力于推翻满清，实行民主政治。回国后，他们分散在国内各地活动，惟龚郁文回到荣县，创办“蚕桑学校”作掩护，发展组织，开展活动。王天杰就是他发展的同盟会员之一。

辛亥年，龙鸣剑、王天杰组织“保路同志军”攻打成都。并与吴玉章一道，使荣县光复独立、占全国各地之先。这些革命功绩，都是清末一些莘莘学子所领导的，而这些革命思想与实践，当然亦为后之莘莘学子所继承与效法。这是荣县学生思想活跃原因之一。

荣县学生思想活跃的原因之二，是新书刊的大量涌入、为他县所不及。北京的《语丝》周刊、上海的《创造月刊》、《洪水》周刊以及新文学作者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张资平、成仿吾、胡适等的著作，潮水般地涌进荣县。其中以鲁迅的《彷徨》、《呐喊》，郭沫若的《女神》、《瓶》、《星空》，蒋光慈的《慈母》，张资平的《不平衡的偶力》，尤为学生所欢迎。当时凡是上海“创造社”和“未名社”出版的毛边书（没有截齐边沿的书），不管是小说或诗集，每到一期，便一售而空。胡适在《新青年》上大力提倡白话文，使学生对他产生了一种偶像，所以“胡适文存”在学生中也很流行。他提倡写白话文的“八不

主义”为多数学生所信奉。由于学生爱读书、书商生意好，应运而生的书店也就增加了三家——“五车书店”、“金玉生书庄”、“文化导扬社”（即旭川书店）。在这一段时期，除商务印书馆印的书外，其它出版的书，出售时一般都要打折扣，折扣最大的降到一折八扣，即定价一元，只收八分。而新文化、新小说、新诗集刊物与此相反，在县城出售要定价加三，即一元定价，实收一元三角，可见当时荣县学生对新思想的追求，对新书之热衷了。

辛亥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新文化、新思想的不断输入，使荣县学生思想活跃，对政治、社会活动十分敏感，自然就会冲破旧礼教的藩篱，搞出些“离经叛道”的事来。如搞“非基督教反帝大同盟”“反帝大同盟”、参加农民运动、打菩萨以反迷信、讲自由恋爱以冲击旧礼教等。如“荣中”迁万寿寺时，寺里的菩萨都是学生自己去打的。刘智明（即柳倩）、李铁桥、曾宗儒等都主张自由恋爱，开风气之先。

二十年代前后，荣县学生中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进步学生，先如曾莱、程觉运、朱俊鹵、苟永芳、曹威武，稍后的熊灼薇、刘一先、刘智明、姚德从；以及再后一些的李铁桥、曾宗儒、罗忠全、虞尧卿、余百川、朱挚、虞刚、晏敏持、范任先等。（上述这些人，是以当时的情况来说的，不是盖棺之论）。

二十年代中期，荣县曾出过一种《荣钟》刊物，是石印的，据笔者所知，（可能是荣县最早的刊物）。这个刊物是青年党办的，由于它不排斥科学与民主法治，也不敌视新文化运动，对荣县学生思想有些微妙作用，学生们对它的态度

是模棱两可，这或许也是青年党重要人物徐思平对荣县人的影响所致。但荣县学生又很警惕《醒狮周刊》，谁要拿着它，就会被学生叫作“狮子狗”。

三、荣县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民国八年（1919）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对日签定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反对巴黎和会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的权益，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全国各省、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致响应。

荣县学生在五月上旬闻“五·四运动”暴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无不痛恨，乃由荣中学生发起成立了“荣县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与全县各界人士响应北京及全国各地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初由“学联”出面，召集全县人民团体，工、农、商会在西街天后宫（即今县供销社址）开大会。与会人士义愤填膺，一致通过：自动与日本绝交；抵制日货；销毁日制商品；清查私存、私藏的日货；严拿私卖私买日货的奸商（大意）。并印发宣言，以“快邮代电”印寄各地人民团体和北京学生，借以互相声援，共赴国难。

荣中、县小的学生，首先倡导打毁、烧毁自己用的日货以示范。仍有不少学生，将自用的日制脸盆、瓷碗、瓷盅、洋袜、洋伞在会场上当众打烂、焚烧。一时烟雾弥漫、尘埃冲天、口号震耳。在场工、农、商各界，对学生们的爱国激情，虽懦夫顽儒面动情。对卖国政府的倒行逆施，无不发指面冲冠。此番大会，气吞胡虏，实开荣县未有之壮观，亦为川南学生沸腾之首。

会后游行示威，贴标语，撒传单，高呼口号“士农工商联合起来！”“打倒日寇！”“收复青岛！”“与日绝交！”

“抵制日货！”……满城商家、皆悬五色国旗。大街小巷，无不痛骂国贼。

“学联”成立后，对各项政治活动无不积极参加。率先响应。如长辛店张之江屠杀工人惨案、上海“五卅”惨案、北京“三·一八”惨案、万县“九·五”惨案、济南惨案、重庆“三·三一”惨案等，“学联”均召开群众大会以示声援，并派出宣传队向大众以讲演、宣传。

“学联”大肆提倡平民教育，每学期都办有平民夜课识字班，由学生自己义务担任教师。

“学联”的组织形式，是由各校选派代表二至三人组成，由代表民主推选正、副会长各一人。下设宣传、交际、文书、财务四股，各股正、副干事各一人，亦由出席代表选出。经费由各校学生自由乐捐，无定额，无限额。

四、“非基督教大同盟”

荣县是一个农村城市，一般农村子弟要想进城读书，谈何容易？在民国初年，农村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家庭，还可送子弟进城读高小和初中。到民国七年以后，四川军阀的“防区制”逐渐形成，军阀们互相吞并，战争频繁，人民的遭遇就更痛苦了。军阀们除一年征收四、五年的粮税外，更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无奇不有。如杨森在渠县防区内，老百姓穿草鞋有“草鞋捐”、打赤脚有“赤脚捐”，……使一般中小地主、富农盘子弟读书都困难了，何况贫苦农民。学生读书经济来源日渐缩短，失学学生有增无减，有勇气的跑上海、走广州，自寻出路，无勇气的株守家园，老死于户牖之

下。在学校将失学尚未失学的学生，精神上就更烦恼了。

民国十五年（1926）放了寒假，一部分学生尚未回家，有荣中初五班学生罗忠全，约集“旭中”学生李铁桥、段永、“荣中”学生范任先、虞尧卿、虞季常、刘恩农……等十余人在荣县“旭阳中学”开会，筹备“非基督教运动”。一些人仓卒应邀而至，毫无思想准备，一切办法，皆出自罗忠全、李铁桥二人。罗忠全在阐述成立这个组织的意义时说：基督教是一个洋迷信，在西方为害作恶，近年来又被帝国主义者用来作侵略工具，麻醉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意志消沉、知识愚昧、驯服于侵略；基督教在中国是“坐地侦探”，搜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情报，倚仗势力，作威作福，压迫人民，欺凌官吏。教堂所在之地，就是帝国主义国威所到之处，法律约束不了它，政府管不了它，如此多的“独立王国”在中国国土上，中国还能算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吗？我们应该想尽办法，把它驱逐出境。今天筹备这个“非基督教运动”的目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驱逐洋人。先用民众的力量打击它们，凡是洋教堂、洋医院、洋学校，都是我们打倒的目标。

当时即有人提出异议，说洋医院是慈善事业，不应与洋教堂一样打倒。李铁桥反驳说，洋人办医院和学校，只是侵略方法和手段的不同，但都是麻醉、奴化青年的工具。自古以来，吃人的魔王，都穿上和平之神的外衣，有时还以女神的姿态抚摹人民。“司马昭之心”是不言而喻的。大家想想看，洋人办教堂、医院、学校的钱从何而来？还不是庚子赔款。远的不说，我们都是自流井附近的人，谁不知道自流井的盐税都被稽核所的洋人收去了，凡是吃盐的人，不论老

小，不论贫富，都负担了盐税，谁也免不了受洋人的剥削。洋人这样吸吮中国人民的血和髓，拿去铸造飞机、大炮、军舰，又来打中国人。洋医院表面上好象是洋人醉饱后的一点布施，其实是一杯有鸩的毒酒……。说完，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随即议定活动日期，印发快邮代电宣言；印发《致工友书》，劝告为洋人服役的中国人与洋人斗争；对洋人则直接予以警告通谍等内容。当即由筹备会的人分头起草、缮写、油印。有的写标语，制国旗，并各自约定，动员组织自己的朋友、同学届时参加。并互嘱保守秘密，以免驻军，团丁前来弹压阻止。

在一个逢场天的上午，一百多学生青年集合在荣中，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北门教堂出发。到了教堂，围绕教堂、医院以及华英学校，来回高呼口号示威，围墙上满贴标语，洋人闭门不出。这是荣县反帝的第一炮声。

“非基督教大同盟”在筹备时，本无“大同盟”三字，后来觉得声势不够宏大，才加上去的，以示全县各阶层、各行业都有人参加。这次活动以后，洋人威风大为收敛，教徒也觉得灰溜溜的。参加这次活动的，都是些高小、初中学生（那时荣县尚无高中），没有一个中年人，很为一些首面人物看不起，说什么：“这些娃儿，胆大妄为，惹翻了洋人，怎么得了？”。也没有女生参加，那时荣县社会中，男女交往，尚有严格的界限。

这次运动没有多久，约在一九二七年春荣县暴发了一场农民抗捐抗粮运动。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如虞尧卿、段永、虞季常、晏敬持都主动地投入农民协会，又有一些开明

人士、学生家长，主动去策动地方团练参加，以至形成“军、团冲突”。学生们搞宣传、当联络，很是活跃。晏敬持与某同学（忘其姓名）当通讯员送信到龙潭，某同学不幸被俘，后惨死于狱中。这次“军、团冲突”当然是军阀暴虐、无休止的剥制造成的，可能是川南的第一次。荣县的“军、团冲突”与仁寿的“军团冲突”性质不一样。仁寿在这同时或稍后，几个县的团练联合反对刘文辉，规模比荣县大几倍，但它是“团阀与军阀”的冲突，不象荣县的“军团冲突”：团练为农民而战，服从农民协会的指挥。

五“反帝大同盟”的斗争

荣县“旭阳中学”，是一所进步的学校，学风开明、教学认真，县内外青年，均以考入“旭中”为快事。威远、富顺、宜宾、犍为、仁寿等县负笈而来者，大有人在。荣县学生运动，历来皆以“荣中”为策源地，“旭中”成立两三年后，学运中心，不知不觉就移到这里来。一九二八年，罗忠全自荣中转入旭中读书，被选为学生联合会会长后，在他和学联各代表的领导下，学生思想和活动更加活跃，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象雨后春笋，如足球会、乒乓社、读书会、扫毒社、青年文化社、野火社、同乡会、自治会……据说各种学生团体有四十多个。

学联开会认为，上次的非基督教大同盟运动，目标太小，限于基督一教，连天主教也落了空。为了造更大声势，经代表们酝酿，由学联发起成立一个“反帝大同盟”活动，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目标，当时报名参加的学生团体就有五十余个。惟有教会学校，没有人前来参加，这当然是他们受了洋人管束所致。荣县学生对教会学生，历来歧

视，把他们都认作“洋奴”。凡路上相逢，必高声大叫“洋尾巴儿洋气臭，割了尾巴才不臭。”以此侮辱他们。所以，每次运动也不去主动争取他们，这无疑是“学联”的失误之处。

“反帝大同盟”成立后，决定以耶稣诞辰的一个星期为“非基督教运动周”，简称“非基周”。

今年“非基周”的活动，在圣诞节前，已由反帝大同盟召集了一个准备会议。第一，决定以荣中、旭中为主，组织一个强大阵容的宣传队，时间选定在圣诞节。当教会举行庆祝活动，突入会场，进行反帝宣传；第二，圣诞节后，再分组活动。并议定，在宣传中恐教徒反抗，女生和小学生不参加，只参予分组活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的上午，“反帝大同盟”一支约二百余人的宣传队，手执国旗，喊着口号，雄纠纠，气昂昂地直入北门基督教堂。当时华英学生、教会信徒在演新剧，台上台下兴高采烈，陡听宣传队喊“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口号，一拥而入，莫不敛容丧胆，各自奔逃。宣传队欲作讲演，但听众已寥寥无几，只有一个姓肖的教会医生，年青气盛，站上舞台，大声抗议，但经不住宣传队响彻云霄的口号打击，也只好下台灰溜溜而去。宣传队当即在教会的建筑上张贴标语，又分别上街宣讲，然后收队回校。

当日下午，宣传队整队向桂林街天主教堂进发，接近教堂时，街道上涌出一批居民群众参加示威声援，使学生们勇气倍增。由于上午的胜利，又欺天主教人少，学生们没有作抗争的准备，以为有如此声威，足可以压服他们。那知事有出人意料之外，天主堂早有充分准备，并预先向县团练局请

来两班武装团丁作保卫，教堂内又有一批身强力壮的持械教徒作争夺准备。一经接触，手无寸铁的懦弱学生反而被糜了。荣中的校外同学刘恩农，刚自成都归来，以“野火社”的代表身份参加，因他身穿中山服和呢大衣与一般学生的土布长衫不同，所以团丁把他作为目标，从人丛中将他强抓进天主堂。学生们因无械斗准备，未能及时将他抢救出来，致使他遭毒打一顿，被转送往县衙门关押。“反帝大同盟”受挫，乃重新布署，整队到县衙门示威，派代表入衙面见知事（县长），要求立即释放刘恩农，惩办团练局长和打人恶棍、教徒。其它学生则在县衙前等候，大呼口号：“打倒军阀！”

“打倒欺民媚外的官吏！”，“打倒为虎作伥的洋奴！”以壮声势。初时，县知事避而不见，反而请城防司令部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一排，威风凛凛地前来弹压。胆小者见状不免惊慌失措，领队的同学不断给大家鼓气，并舞动国旗，高呼口号，全体同学见学生领队不怯阵，精神为之一振，士气又陡然旺盛，口号声不绝于耳。前来弹压的排长，是一个学生出身的青年，同情学生们的爱国反帝行动，他与学生领队打招呼说：我乃奉令维持秩序，不会对你们有粗暴行为，并令士兵与学生相对而坐，显出隔岸观虎斗的神情。闹到入夜，县知事眼见学生声势有增无减，无可奈何，这才出来接见代表，并接受学生要求，当即释放刘恩农，答应惩办肇事人员。学生们见目的达到，乃整队游行，以胜利者的姿态经东街、桂林街，转南街、西街各自回校。

使学生们最难容忍的，是县团练局长张鸣球。此人是荣县人，吃荣县人的饭，做荣县人的官，自甘堕落，作洋奴之洋奴，竟然派出武装团丁，长洋人的威风，弹压学生的爱国行

动。大家原拟把刘恩农援救出来以后，再去团练局，把张鸣球抓出来赔礼道歉，给他一次爱国洗礼，但在县衙出来，已是一更天气，加上团练局有人、枪一百多，没有充分的准备去，难保不吃眼前亏，于是，此议作罢，只好记下他媚外洋奴的帐。

附言：本文对民国四年（1915）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荣县人民和学生的爱国行动未能写出。如亲历此事的老学长们能把它专题写出来，无疑是荣县人民和学生的一件光荣史事，是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罪行的义举。

笔者在县求学时间不长，对一九二七年后荣县学生参加农民运动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只写了一些表皮，尚望亲历、亲见的学长们批评、教正。

回忆荣县盟史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

民盟荣县区分部的活动情况

刘石夷

荣县是川南的小城市，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同志的故乡，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光荣传统。从大革命至第二次革命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历来有地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共产党人与非党进步人士在历史上的团结战